

# 第一章

## 真理标准讨论和 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

---

---

1978 年的秋冬之交，中国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需要在党的高层开展一次大讨论。胡耀邦说：提理论问题要有勇气；邓小平说：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会失去原则，我主张中央开一个会，如叶帅说的，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

---

---



## 第一节

# 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及历史意义作出了明确的叙述。下面是决议中的这部分文字：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

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我了解这次全会。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我也参加过多次讨论。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草稿有关三中全会那段文字时也逐字逐句注意过，认为文中所作的论述除个别的字句外，完全符合这个中央全会会议之前、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的事实。自从这次全会开过到今天，二十年的时间快过去了。现在人们正在对这次会议进行纪念。当我们用这二十年我国的社会实践去检验这个会议时，我认为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上述评价毫不过高，只有不足之处。这是因为在这二十年中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由于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的进步，是起草这个决议文件时所想象不到的。这次全会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其伟大。

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为期五天。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 1978 年 11 月 10 日到 12 月 15 日，为期三十六天。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着重追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为什么我想做这件事呢？请同志们看一

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这个《公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文件。《公报》一开头在叙述了这次全会的出席者和主持者之后，紧接着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在这个中央工作会议 12 月 13 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作了一个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作了一个题解：“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公报》和《邓小平文选》题解中指出的“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两个问题今天可能许多人不那么了解它的具体内涵。我从头到尾出席了这个中央工作会议。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也非正式地列席了。我认为在纪念三中全会时应该根据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实，把这两点讲明白，或者说对这两点作一个很长的“注脚”。我觉得这是在纪念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时，作为历史见证人的我，应尽的一个责任。

我有一个看法，那就是：虽然三中全会是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得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

同。对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作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因此我们今天使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说法。但是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者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准备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到会者中取得了共识。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格是很高的，不但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五位常委）全部到会，而且在十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资格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会的人的 45.4%，也参加了这个会。加上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即现在所说的“三副两高”中的党员，有中央军委常委，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中央直属机关、各中央国家机关、各军委直属机关、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许多重要问题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取得了共识，也就意味着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已经取得了共识。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把原先没有通知到会的中委、候补中委通知到会，就成了中央全会了。

这两个会议，三中全会开得很短，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长，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为三中全会的七倍。但是三中全会是正式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只是起为三中全会作好充分准备的作用。既然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都在

中央工作会议上准备好了，我们就一定要充分重视中央工作会议的作用。中央工作会议是值得纪念的，但不必也不应单独纪念，只要我们认识到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把纪念中央工作会议包括在内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先把这个关于两个会议相互关系的看法写下来。下面我用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说明这一点。

## 第二节

### 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

追忆这个中央工作会议，最好能够介绍这个会议的酝酿和筹备过程。但是我不能根据自己的回忆做这件事。这倒并非因为时间隔了这么久记不起来了，而是我当时就不知道有关情节。我不清楚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不清楚提出召开这个会议后，在几位中央常委之间都经过怎样的讨论，最后又怎样作出了决定；不清楚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华国锋的报告是怎么起草的，在起草过程中是否征求过其他几位常委的意见，如征求过，华国锋对自己原先提出的稿子作过一些怎样的修改；等等。这些情况我当时都不知道，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因此在这里只好不说。当然党史研究会设法查明这些情况，我也希望弄清楚这样的史实（参见附记）。

当然，召开这个会议的历史背景我当时是清楚的：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把他们从党和国家的统治者的地位上拉了下来，除去了这一群祸国殃

民的邪恶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生打开了道路。这是举国上下高兴的事。但是掌握着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华国锋等的立场、观点并没有立即转变过来。华国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深，并囿于自己的水平，同时也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没有也不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愿意让在政治思想水平上，在能力上，在治党治国能力上比自己不知高明多少倍的邓小平出来领导党和国家，因而在1976年10月到1977年3月近半年的时间内一方面提出要揭批“四人帮”，集中批判“四人帮”的“极右路线”，一方面在“批邓”事实上已经搞不下去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华国锋依靠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升到党的重要地位的汪东兴，作为自己最亲密的助手。汪东兴曾参与粉碎“四人帮”的行动，立了功。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上了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还身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等职务。在汪东兴之下还有李鑫和郭玉峰两个小班子，一个管思想政治，一个管组织。像吴德这样的人还在使用，吴德还在十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十一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汪东兴等在实际活动中提出并坚持贯彻“两个凡是”的方针。后来人们知道这“两个凡是”的提法有三个大同小异的版本。最早的一个是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第二个版本是李鑫和他领导的一个理论学习组的人起草，经过汪东兴多次提意见，作过多次修改，最后由华国锋圈定的，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

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那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的那个论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讲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是第三个版本。按照这个方针，邓小平也就不好出来领导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国家，天安门事件和许许多多冤案错案也就得不到平反，我们还要继续实行“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那套路线方针政策。

这样一个方针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群众干部其中包括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强烈反对。1977年5月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信件，局面开始有所改变。两个多月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被撤销的所有职务，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又选举邓小平为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十一大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也有了进展。特别在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期间，大批“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得到平反，回到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由于处理重大案件的大权掌握在中央专案组手中，仍有许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决。1978年2月举行十一届二中全会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中央全会我列席了，五届人大我是代表）。这时候国务院也得到了改组。许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在国家机关中担任了领导职务。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但是当时思想上受“两个凡是”的禁锢，讲的还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那一套。我参加了五届人大华国锋所作《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文件的基

本调子改变不了，我只能做到讲一通拨乱反正的言论，在起草组内同一些人争论一番，但改变不了他们的观点，只能做到“我讲了，我的灵魂得救了”。至于揭批“四人帮”中遗留下来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比如天安门事件性质问题，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要求平反，但是汪东兴、吴德、张耀祠出来反对，因此不但许多 1976 年清明节去天安门追悼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青年还在囚禁之中，而且又有人因为发表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反对吴德的言论而以犯了“恶毒攻击罪”被投入监狱。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继续 [ ] 的 [ ] 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党内 [ ] 个人独断没有受到批判，而吹喇叭、[ ] 不 [ ] 人。对粉碎“四人帮”后继续出现的这样的局面，广大群从干部当然极不满意。

但是“四人帮”[ ]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毕竟是一个大解放。人们比以前敢说 [ ] 话多 [ ] 恢复不了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那种对 [ ] 民暂时无可奈何的局面。人们积极行动起来。进入 1978 年之后，局势有所进步，同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尤其重要的是思想路线尚未端正。1978 年 5 月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某些人的攻击，在讨论中遇到了颇为顽固的抵抗。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张，需要开展一次讨论，让各种思想各种主张碰撞较量，才能求得一个解决。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高兴地得知有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而且收到了要我出席这个会议的通知。

## 附记：一个材料和一个考证

在写这篇追记的过程中，我在故纸堆里发现一个有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材料，经过一番研究，我作出这样一些初步判断。

我查到的那个材料是 1978 年 10 月 14 日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记录，那是当时我抄来的材料。韦国清向邓小平请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总政治部准备发一指示，要求在全军干部中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问小平同志的意见。邓小平答复：“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实事求是很重要，不仅领导机关，就是一个小企业，生产队也应实事求是。……这就是毛主席讲的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思想僵化。……叶帅说，要把这篇东西印发到全国去。”关于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的讲话中也讲到了。华国锋那天讲话时我听得清清楚楚，他说在一次中央常委听 1978 年 7 月到 9 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情况汇报时，大家认为那个务虚会开得很成功，叶剑英听了很满意，提议在理论问题上也开那样一个务虚会，

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这件事知道的人比较多，大家认为三中全会后 1979 年那个理论务虚会就是叶帅提议的，其实叶帅提的理论务虚会就是中央工作会议，当然后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内容丰富得多了，但是叶帅想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内容也是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从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这一点。邓小平说开这个理论务虚会可以起“索性摆出来，免得背后讲”这个作用。摆开来讲，当谁的面，当然是当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面，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这个事。叶帅讲的理论务虚会不是三中全会后 1979 年开的那一个，在 1979 年举行那个理论务虚会时，问题早就已经摆开而且在中央工作会议大摆特摆过了。叶帅讲的那个理论务虚会已经实现为中央工作会议，不是 1979 年的那一个，这一点我还可以从邓小平回答韦国清的第二个问题时的谈话进一步得到证明。韦国清向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能否印发邓小平 9 月间在东北的讲话。那次讲话是很有名的，是讲真理标准问题的。邓小平的回答是“可以在机关少数干部中先讲一讲，给部队发通知，等一下务虚会”。可见在邓小平的心目中，这个务虚会是很快就要召开的，不是以后 1979 年开的那个。

邓小平与韦国清谈话的时间，离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只有二十五六天，看来在 10 月 14 日后不久，中央提出召开中央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举行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 10 月底 11 月初就发出了，因此中央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时间，推算起来在 10 月底，即在这次讲话半个月之内。这是我对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知道的唯一可靠的材料。

## 第三节

# 从真理标准讨论到中央工作会议

在前面我说不能根据自己的记忆来写中央工作会议的酝酿和筹备，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有关的情节。我说的是实情。但是经过这个时期对历史资料——包括我保存的故纸堆的阅读和研究，使我能对真理标准和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间的关联，作出可靠的判断。因而可以专门写这么一节了。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从 1978 年 5 月《光明日报》上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在同年 11 月召开的，两者相距只有半年。它们可以说是有同一的历史背景。但是它们毕竟是两个历史事件，发生在后面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中，就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提出和展开讨论六个月的史实。具体说来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前提，这个讨论的成果是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指导思想。不仅如此，经过叶剑英和邓小平的努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更促成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

我作出这样的判断是有历史发生的事实根据的。

第一个事实是：1978 年 5 月《光明日报》上的那篇文

章发表，引起了叶剑英的注意，且赞成文章中的观点。特别在此文发表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立即转载。可是听命于汪东兴的《红旗》杂志，采取“不介入”这一讨论的态度。他们组织了另外一篇题为《重温 实践说》的文章，文中也提到实践标准这样的问题，但是抹去棱角，不接触反“两个凡是”，因而它在征求意见的过程就有人表示反对，提出意见。《红旗》杂志编辑部的负责人把这篇文章送中央审查，到了叶剑英手中。当时受到李先念主持下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的成功的启发，因此在常委会的会上，叶剑英建议中央召开一个理论务虚会，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别的场合，叶剑英还建议把《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印发。许多人，以前包括我在内以为他的这个建议在 1979 年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时，得到了实现，其实他的建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实现了，因为在这个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叶剑英的要求实现了。

这一点从中央工作会议前邓小平的言论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起草过程，邓小平最初并不十分清楚。从他两次早一些同我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并不知道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写这篇文章的事情，后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的经过，他也并不很准确地了解。他听说有南京胡复明投稿的事，但他以为投稿者是上海的工作人员，他对这篇文章估量很高。

就在真理标准那篇文章发表的当月三十日，邓小平有一个军队政治工作的谈话，那个谈话是针对当时总政宣传部长对那时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两个提法与毛泽东和华国

锋的提法用词不完全一致提出异议，要求在政治部党委和政治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而作的。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就批评“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还有一次他和我们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的谈话。谈话准确的时间我的笔记本没有写明，但肯定在五六月间。胡乔木向邓小平反映了张平化找在京开高等教育工作会议的省委书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两种反映，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很重要的文章须用鼻子嗅一嗅，《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不都是准的，回去议一议有什么意见，赞成、反对都可以说，不要压制争论。邓小平问这个会是不是各省的书记都来了？胡乔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接着又反映：熊复找到耀邦，说《红旗》有成绩，理论文章比较慎重，然后对胡耀邦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耀邦不以为然，说提理论问题要有勇气。胡乔木又反映最近召开的宣传会议，本来报告中有“文化大革命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话，宣传部长们看了之后不同意，等等。邓小平听了情况介绍后说：“这事好办得很嘛，争就是了嘛，都不要扣帽子，在理论上探讨嘛！从实际出发，不要说空话。”

还有一次邓小平和我们谈话，也没有记下准确时间，可能比前面讲的那次早。邓小平说：“现在风声不小，对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就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那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常识。常识不应该成为问题。”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讲要解决问题，理论上就要站得高些。他对我们说，“社会科学院是个研究理论讲理论的机构。理论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

论上迁就，迁就会失去原则。”在这次谈话中，他说自己主张这个问题中央要讨论一下，把问题讲清楚，这就是后来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由来”吧。

如果考虑中央工作会议不久前邓小平和韦国清的谈话，真理标准讨论同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关系就更明显了。这次谈话的时间是 1978 年 10 月 14 日，距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只有二十几天，在这次谈话时，韦国清向邓小平请示，要求在全军干部中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邓小平讲，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实事求是这个问题很重要，不仅领导机关这样，就是一个小企业，生产队也应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都要想想这个工厂、生产队怎样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这就是毛主席讲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思想保守，不解放思想，问题提不出来，问题也解决不了，生产上不去，生产率也提不高，叶帅说要把这篇东西印发到全国去。

从这段话来看，邓小平同叶剑英在“索性摆开来”这一点有过交谈。

在讲了这段话之后，韦国清又向邓小平请示，可否印发邓小平九月初在东北的讲话，对这事邓小平回答说，可以在机关少数干部中先讲一讲，但部队要迟些，等一下务虚会，这句话显示出，叶剑英说的理论务虚会是很快就要开的，后来在工作会议上把这个问题摆开了，叶剑英提出那个理论务虚会的任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了。

当然，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华国锋有他的需要，也有他的考虑，在十一大华国锋作了那个报告，报告中的第二部分《形势和任务》中讲了八个问题，以后开了十一届二中